

● 公共行政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 供求变化及平衡战略^{*}

汪 永 成

(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 汪永成(1968-), 男, 甘肃甘谷人,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 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政府经济职能与行为、香港政治与行政等研究。

[摘 要] 政府能力是一个政府实现自己职能时所具有的能量和资源。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 政府能力一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需求”, 另一方面却由于不断受到各种侵蚀而减少了“供给”。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中国的政府能力建设必须从战略上实现四个转变: 从粗放式的政府能力生成机制到集约式的能力生成机制; 从主要依赖和开发“硬能力”到主要依赖和开发“软能力”; 从强调能力提升到治理流失与提升并重; 从单独依靠政府的能力到借助其他主体的能力。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政府能力; 行政发展; 行政改革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 02-0215-07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当今时代推动民族国家行政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之一。加入 WTO 不仅意味着中国更加深入和广泛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也对政府能力提出了全面挑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形象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浪潮, 如果你没有冲浪的本领, 你就会被淹没。”本文在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供求变化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政府的能力建设战略, 以求教于大家。

一、政府能力的一般理论分析

历史反复地证明, 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 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而没有充裕的政府能力,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于什么是政府能力, 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人从行政主体的角度认为, 政府能力是政府“将自己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1](第 6 页) 有人从行政客体(环境)的角度认为, 政府能力是指政府能否成功地适应环境挑战的程度。^[2](第 29 页) 更多的人则从政府职能的角度分析政府能力, 认为它是指政府在实现自己职能时具有的能量和力量。例如, 世界银行认为, “政府能力是指有效地采取并促进集体性行动的能力”, 也可以说是“有效的提供集体物品的能力。”^[3](第 38 页) 站在这个角度, 如果政府职能是政府“想干什么”或“要干什么”, 政府能力则是指政府“能干什么”, “会干什么”。

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看, 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界定政府能力似乎更为合理。第一, 政府能力总是和完

^{*} 收稿日期: 2001-07-09

成一定政府职能的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履行任何行政职能必须以一定的政府能力作为条件和保证,政府能力直接影响行政职能实现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和绩效的优劣;另一方面,能力又总是在实现行政职能的行政行为中外显的,人们也总是从完成一定活动的角度来了解、考察和确定一个政府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离开政府职能谈政府能力是比较空泛和抽象的。第二,政府职能本身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范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它与行政主体、行政环境、行政目标、行政工具、行政绩效、行政过程等都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从这个角度界定政府能力,统摄性、包容性和解释力都较强。

政府能力作为政府所具有的内在能量或力量,它的大小强弱取决于什么?我们认为,政府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拥有的以下 7 种资源:(1)权力资源。汉密尔顿认为,公共权力是“与政府的能量直接有关的。”^[4](第 177 页)的确,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是政府能力的根本,它不仅直接地构成了政府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它还构成了政府能力区别于其他主体能力的质的规定性。(2)财力资源。财力是政府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5](第 94 页)缺少财力资源这个“经济基础”,政府自身就不能存续。(3)人力资源。“人是行政之本”人力资源是政府能力中的前提性因素,也是主导要素。人力资源包括量与质两个方面。其中,对政府能力的高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人力资源的质的方面。(4)文化资源。行政文化作为行政行为的“密码”,是政府能力的一个传统变量,是一种影响巨大而持久,且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无形的“软”力量。(5)权威资源。“权威关系是支撑政府的基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6](第 14-15 页)在现代社会,来自于权威的公信力对政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公信力,即使拥有充裕的权力、人力、财力等要素,那也必然是一个“软骨巨人”。缺少公信力的政府要达成任何行政目标都需要成倍的财力和权力。(6)信息资源。信息是具有价值性、有效性、经济性的知识。信息既是政府系统的中枢神经,也是重要的资源。信息力是一个政府收集、传递、转换、拥有、加工、运用信息的能力,它渗透于各个分力之中,是其它“力”的催化剂和倍增器。(7)制度资源。亨廷顿在他的研究中注意到了政府组织制度化对政府能力的影响。他说:“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政府。”^[7](第 26 页)

这些资源要素在政府能力系统结构中以“力”的形式体现出来,换言之,政府能力的构成要素相应为:人力、财力、权力、公信力、文化力、信息力和结构力(制度力)。这七种“力”构成了政府能力的内在基础和基本素质,它们之间的不同配置和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形成了合法化能力、调控能力等政府能力的具体形式。这几种力量中,人力、财力、权力是物质性的“硬”力量;公信力、文化力和信息力是非物质形态的“软”力量,而结构力是行政系统内部“硬”力量和“软”力量之间由于组织、管理和调控而产生的“协同力”。严格来说,结构力也是一种软能力。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供求变化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和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显而易见,经济市场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是民族国家(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下同)行政环境深刻的变迁,必将对民族国家的政府系统的各个层面产生广泛而深刻、持久而复杂的影响。就政府能力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民族国家的政府系统将日益面临一个新的矛盾: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的新扩展而对政府能力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权力的不断被销蚀等因素,使政府能力的“供给”不断减少。以下,我们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需求变化分析

从本质上讲,政府能力是政府与环境互动关系中政府活动的可能性与限度,因此,政府能力强弱“既依赖于政府本身的特点,也依赖于政府试图驾驭的那个社会的特性。”^[8](第 294 页)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政府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的不断增加或提高,这样就需要不断地增加政府系统的能量(政

府能力),否则,就不能达成政府系统与行政环境的动态平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能力的需求变化主要通过政府职能拓展、强化反映出来。具体而言:

1.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政府职能增添新的内容,扩大内涵。首先,经济全球化客观需要民族国家的政府承担治理“世界市场失灵”的新职能。这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有相应的新发展:各国政府不仅要致力于治理本国范围内的市场失灵,而且还要参加治理世界市场失灵的“全球集体行动”,如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全球性环境保护职能、人口控制职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职能、避免和控制国际冲突职能、打击毒品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职能等。虽然民族国家的政府承担上述职能的方式可能不同于治理国内的市场失灵,但无一例外地需要相应的能力支撑。其次,经济全球化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实施(继续实施)追赶战略的职责。当经济全球化将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裹胁”进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垂直型”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是高附加值的,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拿初级产品、低附加值的产品与之交换。发展中国家要走向振兴之路,只有千方百计地从“垂直型”国际分工中摆脱出来,实施“赶超战略”,挤进水平国际分工,挤占高附加值的商品市场。对那些欲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需要克服一般的市场失灵,而且需要通过“政府替代”克服“市场缺损(市场主体不发育、缺少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残缺等)”。为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承担起部分替代市场的职能,通过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迅速地培育和扩张市场,在致力于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任务(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着手推进它们正在完成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知识化等目标。也就是说,对一个有抱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参与全球化意味着承担多重责任。

2.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强化某些政府职能。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强化发展中国家政府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职能。全球化进程必然伴生许许多多危及民族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不断增加的金融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资本流向突然变化所产生的巨大风险、经济间谍战、附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运用“金钱政治”影响他国政策之制定,等等。目前,经济安全已经是发达国家政府关注的焦点,在国家安全中占有突出位置,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其次,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强化民族国家维护本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能。经济全球化使得维护本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情况复杂化。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能否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 24 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然而,更大的变化发生在通讯领域……它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穿越国界,使人可以听到和看到外国人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它也使富国和穷国之间比五十年前更了解它们之间的差距,刺激人们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这些变化使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越来越难以控制本身的命运。”^[9](P. 332-333)目前,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成百上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转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造成全球性的大恐慌”已是一种现实,说明保罗·肯尼迪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危及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不只是“全球性的金融和通讯革命”。例如,实力超过许多民族国家的跨国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行贿、支持某些政党候选人或以金钱资助政变的方式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政策走向。第三,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强化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职能。经济的全球化表明各国利益依存度的提高,但同时各民族之间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也将更激烈。而这种竞争具有无政府性和“有规则、无裁判”的特点,“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对各个行为实体都能加以限制和约束的最高权威或强制中心,无论什么规则或协议都缺乏有效强制实施的工具”^[10](第 17 页),而经济全球化正是在西方强国主导、支配的既存秩序下展开和发展的,正如有人指出:“(经济全球化)”“对西方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涵义。这一战略的要旨是,以技术和资本的全面优势,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实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产权的目的”。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全球化这一概念被用来表示这种由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过程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扩展的过程。”^[11](第 215-216 页)显而易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基于国际市场经济主体实力与地位的不对称、国际市场经济规则与制度安排的不公

正,即使是自由贸易,其本质也是不对称、不均衡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优势以及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总是千方百计地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强者为王,先者为君”的这一特点和事实,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强化与西方强权相抗衡、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能,否则,必然任人摆布,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护。

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曾深刻提出:全球化“与其说是削弱了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也意味着政府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能力需求。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供给变化分析

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能力供给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政府能力的决定因素和政府能力的具体运用形式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第一个层面看,如前所言,政府能力由权力、权威、人力、财力、信息、制度、文化资源等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以上资源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就财力来说,“国家间争取国际流动投资者青睐的竞争,导致对资本征税的能力下降”^[12](第 103 页);就人力来说,面对实力雄厚、待遇优越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机关越来越难吸引到一流的人才,尤其是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就制度资源来说,一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机制时,首先被要求接受现行国际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决定本国的经济体制时不再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必须与国际接轨,削弱了自主性;就信息资源来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国家越来越对信息和通信本身的管理和控制无能为力;就文化资源而言,经济全球化中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将使文化平均化、扁平化、庸俗化与贫瘠化,而缺乏独特化、精致化、深度化、异质化和本土文化的泡沫化,可能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自我的内在殖民而不自知”^[13](第 85 页)。

我们知道,政府能力的根本要素是政府的权力和权威,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能力的侵蚀也最集中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有学者形象指出:“当第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地横扫全球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14](第 383 页)。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仅导致政府权力无形之中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组织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中去。这样,原本由一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独有的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政府权力有形之中向下转移,例如,某些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日益不受母国约束,不以母国利益为准绳,它们的权力越来越大。民族国家政府权力配置格局的这种变化具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意义。就政治意义来讲,这种权力配置格局的变化,“将出现各种拥护地方、地区、国家和全球各层次权力大转移的集团。这种‘层次政治’可能把拥护者分成阵线分明的四个集团:‘全球派’、‘国家派’、‘地区派’和‘地方派’。每个集团都将狂热地维护自己想象中的独立性(还有经济利益),也都将寻求盟友。”^[15](第 281 页)这会使得民族国家的行政系统(尤其是中央行政系统)变为“较小也是较少权威的单位”^[14](第 383 页),造成公民对政府公共管理的疏离感,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从而降低公民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合法性认同水平。

从第二个层面上看,许多领域中的政府能力已经并将继续下降。举例来说,引进外国资本解决了发展资金匮乏的问题,但外资按国际规则运行,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相应有所下降;外国公司在本国投资办厂使用的是该国的土地和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削弱了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和领土管辖权;本国国内企业产权形式的多样化,使国家难以确定民族工业的范畴,保护民族工业这一传统经济主权的内容大为弱化;随着资本的流动性日益增强,民族国家的政策已不再具有强制企业和投资者在他们非自愿的情况下尽其社会责任的能力。^[12](第 103 页)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凸显,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府能力的有效供给不足,它将直接影响政府系统功能的发挥。

三、面向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政府能力建设战略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时代推动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变量之一,它设定了行政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或者说内容就是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解决政府能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优化政府能力与职能之间的配置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能力在社会自身和市场机制已经起作用的地方退出。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则需要不断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增加能力的有效供给。对面向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政府而言,政府能力的建设必须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一)从粗放式的政府能力生成机制到集约式的能力生成机制

目前中国许多政府部门的能力生成机制是粗放式的,其特点是,对于社会资源的汲取和占有抱着“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人(钱)多好办事”等观念,政府职能的实现往往采用人海战术,以钱开路和权力威慑策略,缺少成本—收益意识,资源投入和能力产出之间不成比例,资源浪费严重,行政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不高。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政府能力生成模式必须实现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型:任何财力资源的投入都要“衡工量值”,任何权力资源的运用要保持目的的纯洁性,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主观能动性、信息资源对其他要素的倍增效应、系统结构优化对其他要素效能的放大效应、文化资源对其他要素效能的催化效应,实现政府能力的持续提升。

在这一转型中,尤其要开发利用现有的权力资源,使之充分发挥效力。“最大限度地加强政府的权力能力,使政府手中现有的权力得到高效、充分的使用,这是提高政府能力的关键。”^[16](第24页)(1)政府权力必须相对集中化。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适度集中权力,使之高于任何地方或区域的权力。(2)政府权力实施保障化。必须使政府现有权力的合法运用有强大的法律保障和物质保障。(3)政府权力必须高度净化。在政府系统内部,要尽量去掉消解和腐蚀权力效能的腐败因素或杂质成份,要约束政府工作人员对权力运用的随意性。(4)政府权力配置合理化,建立现代化的、稳定的、有效能的权力结构。

(二)从主要依赖和开发“硬能力”到主要依赖和开发“软能力”

发展中国家政府所依赖和开发的政府能力主要是物质性的“硬能力”——政府能力的总体形态要么是权力主导型的,要么是财力密集型和人力密集型的,对结构力等软能力的开发力度不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提高税收比例会降低本国吸引外资等方面的竞争力,扩大行政权力不仅面临本国社会越来越大的阻力和反弹,也与国际机制的要求要冲突,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中提取物质性资源的弹性空间将日趋有限,所以,今后中国政府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必须以硬能力为基础,将公信力、文化力和信息力、结构力的开发和提升置于比硬能力更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持续开发政府的制度资源、权威资源、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

第一,平稳转换公信力的基础。必须对目前建立在政策绩效基础上的公信力进行转换,通过尽量依靠现有的民主秩序,逐步增加公民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提高行政的民主性、透明性和回应性,赢取更扎实的民意基础。

第二,创造性地转换文化力。创造性地转换文化力,就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和社会发展大势,适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和科技革命不断推进的全新行政环境,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优秀传统同世界先进行政文化成份相结合,实现如下几个向度的转换:从相对封闭到不断开放、从消极保守到积极进取、从神秘到公开、从少数官僚集权到普通大众参与、从资历和级别本位到能力和绩效本位、从强调伦理和人治到强调理性和法治、从强调行政的权威性到崇尚行政的服务性,形成科学的行政思想,自觉的行政意识,健康的行政心理,开放的行政观念,良好的行政习惯,高尚的行政道德。

第三,将信息力作为政府能力新的战略增长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信息化社会,信息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应将信息力作为政府能力新的战略增长点。

第四,通过管理创新,持续开发结构力。结构力提升可以通过管理创新在要素、机制和制度三个层次上进行:(1)在要素管理层次上进行制度创新,进行各项管理制度如公务员制度、财政制度等管理制度创新,约束要素运行过程中的人情性、随意性、主观性和经验性,建立一个“照章办事”的政府,充分发挥各要素效能,这是提高结构力的基础工程,具有重要意义。(2)在要素之间进行机制创新,建立灵活高效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等。(3)在机制之间进行总体性的体制创新。如果说机制是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模式,体制则是各种行政运行机制的有机媾和,通过整体设计和长期努力,使政府与人民、政府与市场、行政与立法、政党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物质与精神、财力与物力、人力与权力等等各种关系平衡发展,相互适应、相互协同、相互促进,建立富有弹性的政府体制。

(三)从强调政府能力的提升到提升与治理流失并重

要改变目前政府能力发展过程中重提升轻流失治理的现象,要防止和治理政府能力因为管理不善、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而流失。对于这样的能力流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科学的预测和正确及时的预防,以保持政府能力的高效力。

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政府能力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和耗损来自于腐败。约瑟夫·纳伊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浪费了一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17](第 351页)世界银行也指出:“腐败亵渎了公众的信任,也侵害了社会资本。用一笔小小的额外开支换取政府的服务似乎是一种不大的过错,但它不是惟一的损失——腐败具有深远的外部效应。如果不监督,看起来很小的违法行为不断积聚后,会慢慢地使政治合法性的损害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不腐败的官员和公众也会认为没有必要遵循运作规则。”^[13](第 102-103页)如何反腐败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在我们这个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基本价值理念的国家,通过制度创新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应该说是完全可能的。

(四)从单独依靠政府能力到政府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和能力

在现代的新行政环境下,“任何一个行动者,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解决复杂多样、不断变动的问题所需的所有知识和信息;没有一个行动者有足够的有效地利用所需的工具;没有一个行动者有充分的行动潜力单独地主导一个特定的政府管理模式。”^[18](第 92-93页)因此,解决政府能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必要突破政府为惟一治理主体的思路,从单独依靠政府的能力转变为借助其他主体的能力和资源实现政府的职能目标。这意味着:在国内,发展政府与民间力量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实现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共同治理。目前,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governance)理论为解决政府能力供求方面的矛盾提出了富有启发价值的思路。这一理论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 and 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职责均在于此。”^[19](第 45页)这一理论最主要的主张是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运用各自的资源、知识、经验和技术,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应该说,无论是治理的实践还是反映和指引这种实践的理论都还不成熟,但是这种理论和实践所倡导的借助市场竞争机制、社会的力量(私人部门或第三部门)弥补政府能力不足的思路是符合行政发展方向的。在国外,加强国际合作,借助他国政府的能力与资源,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各国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时代,加强国际合作,与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共同行动,是相对提高政府能力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在全球化时代,许多社会公共问题不仅在国内社会而且在国际社会都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关联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9.11 事件所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因此通过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利用各自的资源和能力,共同行动,实际上是相对缓解了一国政府能力不足的压力。

参 考 文 献

- [1]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 [2]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G·宾戈姆·小鲍威尔.比较政治:一种发展观点[M].纽约:小布郎公司,1966.
- [3] 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 [4] [美]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美] 林德布洛姆. 政治与市场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2.
- [7]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 [8] [英] 代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Z].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9] Raul Kennede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 [10] 畅征, 王杏芳. 国际政治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 [11] 刘靖华. 霸权的兴衰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 [12] [德] 跃尔夫冈·施特雷克. 国际化经济中的工业关系 [A]. 乌·贝克, 哈贝马斯. 全球化与政治 [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13] 吴琼恩. 行政学 [M]. 台北: 三民书局, 2000.
- [14] [美] 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3.
- [15] [美] 阿尔温·托夫勒. 力量的转移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6.
- [16] 辛向阳. 新政府论 [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
- [17] [美] 约翰·瑟夫·纳伊. 腐败与政治发展: 成本—效益分析 [A]. 王沪宁. 腐败与反腐败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18] [英] 罗伯特·罗茨. 新的治理 [A].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9] [英] 格里·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 五个论点 [A].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叶娟丽)

Governmental Capacity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upply-demand Changes & Balancing Strategies

WANG Yong-ch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WANG Yong-cheng (1968-),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Lecturer,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governmental economic functions and behaviors and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Abstract The governmental capacity refers to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a government. As with the government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ir governmental capacity would, on the one hand, face more demand while it would, on the other, yield less supply after encountering some kinds of eros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capac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transitions in the four aspects from the “extensiv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al capacity production to the “intensive” mechanism; from depending on and developing “hard capacity” to depending on and developing “soft capacity”; from emphasizing capacity improvement of emphasizing both the reduction of loss and improvement of capacity; from depending solely on governmental capacity to absorbing the resources of other actors.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overnmental capacity;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reform